

来华游记的东方主义模式化写作

——以福琼《两访中国茶乡》为例

敖雪岗^①

[摘要]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来华游记的写作开始呈现出东方主义的特征,以西方为中心,用作者自身的民族文化来观照东方文化。游记写作也开始凝固成一种固定模式,一是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因凝固而难以沟通的对象;二是将空间距离转换成时

Orientalism in Robert Fortune's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o Xuegang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travel writings by Western adventurers to China bega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ism, centered on the West, using the author's own national culture to observe Chinese culture. Travel writing also began to solidify into a few set writing paradigms, and one of them is to regard Chinese culture as a static object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Another paradigm is to convert spatial distance into time distance, regarding China a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West. Through such paradigms, the West thus obtains discursive domination over China. British botanist Robert Fortune's travelogu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is a forerunner.

[Key Words] Orientalism; travel writing; Robert Fortune

从马可·波罗来华旅行开始,后来又有欧洲航海家、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到了十八世纪末以后,更多外交官、探险家和商人来到中国,这些人纷纷写下中国旅行后的游记或书信,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这些描述性著作,随着时空的流变,以十八世纪末最为辉煌,此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介绍大有衰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游记更是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在游记模式中,中国俨然已成被殖民化,并被以半殖民地

^① 作者简介:敖雪岗,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文化教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正如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所说,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由你生长的文化环境提供给你的(Stocking, 1968:145)。实际上,每个游者都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些常识观念以及知识体系,然后用这些观念和这套体系来观照周围的世界,这样,世界对每一个游者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一旦游者遇到一种新文化,一种异质文化,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可能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对周边社会和自然进行构建的众多方法或者说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这些异质文化有他们自己应对环境、相互打交道的一套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组建起社会,发展出自己文化。

游客书写游记,或写作书信向国内介绍他国文化,书信和游记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中介的作用,在他文化和自身熟悉的文化之间调和一下,但具体是哪一种调和方式要看他者文化与母文化之间冲突的强烈程度,有赖于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写作者是否坚信自身文化与理念有关。

所以游记通常都带有自传性质,是作者个人内在和他所处时代背景的一种反映。作者来到一个新鲜地方,他活语言看到的异种的部语言学家。作者游记家进这些国家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对这个地方进行一次重构。对外国人来说,他要用自己的母语来介绍一个他国,介绍的过程也就是重构这个国家的过程(Porter, 1991:19)。这种重构,既是外界真实的反映,同时又是作者个人关注焦点和视野的反映,他关注哪些东西,记录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他有意无意选择的结果。他对异域风情、物产、民俗的描绘,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和体会,也因此打上了作者自己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思想、情绪等烙印。所有这些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因素都影响着作者对异质文化观察和记录之真实(Reiser, 1997: 14-15)。

元朝时来华白民教士的人物群,改变了欧洲人的认识。以传教士为一人,他们以耶稣教为世界中心,对远东地区以及外传耶稣和伊斯兰教少有什么公共。在传教士们来华的过程中,耶稣教士们带来了他们的宗教知识,以及得高了东方的开辟(傅德斌, 1995:124)。随之而来传教士来华教士们是耶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因此一种全新的文

化的文化,为了顺利传教,他们采取由上到下的传教策略,所以对中国文化采用一种接纳包容的态度;不再依靠他那由母体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双眼,而是试图从一种新构建出来的理念体系来理解他者文化。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同情之了解,称赞中国的政治、道德哲学等制度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甚至不无仰视地看待中国,沿用中国人美化自己国家的说法,把中国称为“天朝”或“花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古国,在文明程度上不低于西方世界。于是在写作介绍中国的游记和书信时,这些作品就都带有一些自我文化反省的性质。而这些游记和书信传到欧洲,引起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

上真正完美的形象。伏尔泰也曾说:他们有最完美的道德科学,它是科学中最重要的(赫兹, 1995:260)。他们对中国进行一个完美的崇拜。

十六世纪结束期开始,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西方渐渐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工业机器

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其实,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头脑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已经大大增长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包括在赫德,对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已经有了较为基本的认识。

过了它的巅峰,即使不是束手待毙,也是停滞不前了。随着启蒙运动的伟大革命,一种崇拜科学精神的潮流,席卷了欧洲,也伴随着西方人对整个世界的了解(诸如希腊、印度等),到十九世纪,西方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越感,将西方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他们通过对新发现的

一部分著作,是科学史上的伟大著作,试验室里的动植物标本,用显微镜或手术刀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中产生出一种可以支配、重构东方的西方模式。中国和印度、非洲等地区一

的,那么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这股潮流越演越烈,而鸦片战争前后,正是这股潮流逐渐成形的时

候。这一波浪的国人来华健忘,与此前国人健忘有了显著不同,同时又开了后来国人健忘的

也因此和此前外国人不太一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某些方面开

二

东方主义的游记写作模式就是以西方为中心,固守作者自身的母文化来观照东方文化(萨义德,1999:2-6)。具体到西人的来华游记,其模式有二,本节介绍第一种,即,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凝固化因而难以交流的对象。

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观念在西方渐渐深入人心,来华游者在通过所谓科学考察之后,认为自己抓住、掌握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本质特点。我们以福琼的游记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写作后面体现的思维模式。福琼因为与鸦片走私船一起待过一段时间,见识过清朝海军的行事方式,他于是断言自己发现了中国将领与军队的特点。他写道: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某位以英勇善战而知名的海军军官,也会迎合世界各国的排

就是武力消剿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那些小鸦片船队都都移泊在烟台、烟台

其实,这种态度本身就表明福琼内心对中国的一种排斥,对中国及中国文化采取一种完全视为他者,难以交流、难以变化。将中国看做是化石,摆出一副摸清了中国人中国政府办事特征的样子,这其实是西方汉学的一种潜在意识,即把中国看成是一种业已僵化死去、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福琼对中国特点的描写,也体现了这种潜在的排斥性,其他游记没有,它也是异常的、热切的。“我在他的灵,道教,或者讲道教,这种与吾人儒家传统的联系,竟能在寻常庙宇进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的,我们天朝上国的臣民们在很多方面都与他们恰恰相反。”(福琼,2015,88)而这种对异的探索的焦点反过来又成为中国的象征。正如美国学者博埃顿所说,像福琼这样的旅行者来道其者“所凭借的就是他们手头所掌握的西文化的知识及其权威性的象征,然后又把这种知识和象征在他们之间致意”(博埃顿,1988,14),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象渐渐僵化凝固。

三

与作游记的第三种,是把中国当做是落后国家的西方,这如同中国对时的西方,或者说是殖民时代的美国某个地区。中国与西方国家空间距离遥远,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这种空间距离,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将空间距离转化成时间距离,将另一个空间中的国家当作更早过其的母国,从而方便让读者们产生一种切身的感受。福琼在其游记中要求村建筑的文字中,便有类似的做法,他将中国农村与中国前的苏格兰农村相比。“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和石头砌成,质量不好,房屋地面则是潮湿的黏土,其居住条件就连安置牲口都颇为勉强。这样的房子以前苏格兰也有,但是请天谢地,如今它们都尘封在历史中去了。我这位新来的房子也不例外,关不严密,台阶坑坑,硬硬黑黑,又脏又湿,蚊蚋,猪、狗、猪、狗,屋里屋外到处都是,显然,对于这儿,它们和主人一样,享有同等的主权。”(福琼,2015,41)又比如,提到中国多灾之气的镇压,“沿岸各个乡镇的村民之间也常常发生械斗,在这方面,他们倒与封建时代的英国边境上的那些村庄相似,那时候,跟加那尔人一样,他们

把国家、国家制度与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个人崇拜,把国家当作不断发展的崇拜一样,最终各个社会都达到同一个终点。这种观点一直或到美国人雅各布·瓦斯的出现,才产生了一些改变。如果是这种观点来做背景,那么把中国看成一个早熟的西方版本,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中国比西方落后。

包括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旅行者的东游游记。福琼的游记无疑是其先驱和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 [1] George W.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